

# 历史视角下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研究进展及述评

张俊<sup>1 2</sup>

(1.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028; 2. 兴业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福建福州 350003)

**摘要:** 本文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角度,对当前国内外将历史事件及历史数据应用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进展进行回顾和评述。对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内容及困难加以阐述。其中,主要用到的方法包括工具变量法、倍差法和合成控制法等;研究的内容则主要将历史与一国现今的制度和文​​化相结合,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及发展存在差异进行解释。目前,阻碍历史视角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历史数据的缺失。通过综述历史事件、历史数据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介绍国内外研究的最新进展,对促进历史事件和历史数据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意义重大。

**关键词:** 历史数据; 历史事件; 发展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2016)02-0018-08

## 一、引言

对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及其原因,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作为解释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理论:从最初的“哈罗德—多玛”模型到索洛增长模型,从新古典增长模型到内生增长理论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经济增长的源泉。

大体来说,决定一国经济增长及不同国家差距的直接因素无非是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但它们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其本身就是增长表现的一个方面(诺斯,1973)<sup>[1]</sup>。之前的经济增长理论往往停留于从劳动、资本、技术等方面,通过建立增长函数来分解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些增长模型存在一个共同的局限表现在它们都只解释了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或近因,而对引起世界各国不同增长路径的根本原因

则没有解释。即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各国不同的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导致了各国不同的增长,但进一步是什么原因导致各国存在不同的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呢?这就是需要解答引起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对于该问题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都从多个方面加以解释,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回答,Acemoglu(2008)大致从一个国家的运气、地理、文化、制度四个方面加以解释<sup>[2]</sup>。但是无论是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发展经济理论,在研究各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时,似乎都忽视了历史在塑造一国今天的经济成就或灾难中所起的作用。

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经济史学家就尝试从历史事件中寻找经济增长的来源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上,通过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自此后学术界将这种新经济史学研究归纳

收稿日期: 2015-10-15

基金项目: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3AZD073)。

作者简介: 张俊(1986—),男,安徽宣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兴业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金融经济学。

为“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s)的范畴<sup>①</sup>。历史计量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诺斯、戴维斯和福格尔等人。其中,福格尔因在历史计量学中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而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sup>[3]</sup>。严格的说历史计量学属于经济史的学科框架,其研究范围主要运用统计数据 and 定量的分析方法研究历史事件对特定历史阶段的影响。正是通过依靠统计资料,运用计量经济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史,从而改变了经济发展史的传统研究方法。与历史计量学不同,历史视角下的经济学研究,更接近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历史事件或历史数据主要是一种研究的工具,而不是研究的对象。历史视角下的经济学研究能够跳出经济史研究的局限,将特定的历史事件作为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某一片段,用经济增长理论或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其对人类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出发,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历史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相关文献,介绍主流文献使用的研究方法,研究的主要方向及主要的困难,以期对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 二、历史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表现

### (一) 历史与制度

一个国家经济的良好运行离不开完善的制度,而制度是否完善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资本积累、规模经济等。正如诺斯(1973)所指出的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制度提供刺激后的结果<sup>[1]</sup>。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么是由于制度没有为创新提供激励。而深入挖掘一个国家的制度的决定,则是从根本上解释经济增长差异的源泉,而当今各国制度的演化又与其历史紧密相连。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Acemoglu(2001,2003,2005,2011)对此做了大量研究<sup>[4][5][6][7]</sup>。15世纪新航道开辟之后,西欧与世界其它各洲联系日益密切,Acemoglu(2005)分析了新航路开辟之后,大西洋贸易对西欧各国经济增长的影响<sup>[6]</sup>。1500年之后欧洲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些能够进入大西洋国家的增

长,以及通过大西洋与新大陆,非洲和亚洲的大量贸易。这种贸易及相关的殖民主义不仅直接的影响着欧洲,同时间接的通过制度变迁影响欧洲。那些专制主义不太强烈的国家,大西洋贸易壮大了商人团体,并对君主的权利的约束进一步强化。在制度上,帮助商人获得了保护财产权的制度变革。这些变革对随后西欧经济增长极为重要。例如,虽然16世纪西班牙与葡萄牙从新大陆转移大量资源而获益,但它们没有支持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从而使得其经济增长不如当时的英国与荷兰。

历史上,制度变迁对欧洲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如Acemoglu(2011)研究了激进的制度改革对一个国家的带来的长期影响<sup>[7]</sup>。大革命前的法国,没有统一的民法,南部地区实行的是成文法,北部地区奉行的是习惯法。1789年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取得革命胜利的资产阶级着手制订统一的符合自己阶级意志的新民法来巩固胜利成果,并发展资本主义。诞生于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是为保护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果实而制定的,但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法国。随着拿破仑在欧洲的军事扩张,其对被占领地区也进行了同样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改革,并将该法典应用到被占领地区。Acemoglu(2011)利用当年被占领过的德国地区的数据,分析激进的制度变迁可能带来的影响<sup>[7]</sup>。使用历史上这些地区城市化与就业结构来衡量经济状况,并将被占领地区与非占领地区进行比较。发现当年被法国占领的地区,法国的占领短期内会给当地经济带来不利影响,而从长期来看,被占领地区要比非占领地区发展的更好。在排除可能影响两类地区经济发展的其它因素,及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之后,所得结论依然显著。

另一方面,殖民主义对被掠夺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长远影响,而不同的殖民方式会带来不同的结果。Acemoglu(2001,2003)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为什么同样是殖民地其经济表现却存在巨大差异<sup>[4][5]</sup>。而前殖民地国家制度与其历史上的殖民方式密切相关。殖民者对移民死亡率高

<sup>①</sup>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s)又称计量经济史学(Econometric History),是新经济史学的一个主要的研究分支。由于历史计量学主要是以经济计量方法对经济史进行研究,因此有些文献将其与新经济史学相等同。

的地区采取掠夺性的统治,而对移民死亡率低的地方采取民主的统治方式,并将本国的先进的政治制度移植到殖民地国家。由于历史的路径依赖,形成当今的制度差异及其经济增长的差异。

沿着该思路, Banerjee(2005) 用印度的历史数据,通过比较历史上英国殖民过的地区与未殖民过的地区土地制度的差异,研究了土地制度的长期影响<sup>[9]</sup>。历史上,印度那些未被英国占领的地区,大量的土地被地主阶级占有。而曾经被英国占领过的地区,土地主要被殖民者占有,地主阶级则较少。在印度独立之后,这两类地区历史上不同的土地制度对其社会阶层的构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非英国占领的地区社会分歧更大,从而影响到今天的经济表现。Banerjee(2005)从公共投资的角度,解释了历史上不同的土地制度产生长期影响的原因。与 Banerjee(2005) 思路类似, Dell(2010) 采用秘鲁地区历史上的“米塔制度”来说明其通过土地保有期、公共物品供给和市场参与对经济发展的持久影响<sup>[10]</sup>。西班牙殖民者 1533 年征服了印加古国,并延续印加古国的“米塔制度”(Mita, 西班牙殖民者在秘鲁发现秘鲁最大的银矿,为开采这些矿山,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实行的一种特殊的徭役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印第安人每年定期要向殖民当局提供男性总数的 4% ~ 14%, 从事强制性劳动,此为“米塔制度”)。相对于非米塔地区,受米塔制度影响的地区,其土地产权制度及公共物品供给(表现在道路网络体系的差异)都受到很大的冲击,而公共物品的差异会引起地区农民市场参与度的差异,从而造成收入的差距和生活水平的差异,并且该差异一直延续到今天。Dell(2010) 的贡献是找到了宏观经济制度或政策影响微观经济活动的传导渠道——产权保障、公共物品供给和市场参与度,在一定程度上,将 Acemoglu(2001, 2003) 的工作进一步推向前进<sup>[4][5]</sup>。

## (二) 历史与文化

历史影响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渠道是文化。文化对于一国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其直接影响经济人的行为规范。如信仰、合作、偏好、习惯等都受文化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又会进一步通过经济人的行为影响市场运行,甚至一国的长期发展。但由于文化这一概念比较抽象,其不像劳动、资本、技术这些指标易于衡量,因此,在经济

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中,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常常处于黑箱之中,无法定量的衡量其具体贡献大小。此外,文化本身如何决定也十分的复杂。由于一国的文化或行为规范的形成长期过程,而历史的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尝试从历史的角度,利用历史事实和数据,揭示历史与文化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研究历史、文化与发展之间联系的诸多文献中,最著名的是由 Weber(1920) 所提出的假说, Weber(1920) 认为新教改革为西欧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sup>[11]</sup>。他认为新教与天主教区别之处是,其赞同努力工作的美德,及允许人们对财富的积累,而这些新教的伦理道德成为现代工业经济市场的道德基础。针对 Weber 的理论, Becker(2009) 从人力资本模型的角度分析新教经济史, Becker(2009) 认为人力资本理论能解释宗教信仰的差异对经济的影响,即宗教信仰的差异是通过人力资本体现出来并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sup>[12]</sup>。

Becker(2009) 的逻辑是受新教教义影响,新教入学率高于天主教,而高入学率转化为人力资本,进而导致较高的经济增长。从而用历史上人力资本的数据验证了 Weber 关于宗教改革对欧洲经济长期影响的论述<sup>[12]</sup>。与 Becker(2009) 的思想类似, Bai(2011) 使用中国 1840 ~ 1920 年传教士的数据,对传教士如何促进中国当时经济繁荣提供了一个经验解释:对那些卫斯理宗、浸会宗和路德宗盛行的县,传教士建立了许多小学和医院,从而导致西方知识的传播和人们健康的改善。而加尔文宗传教的地区,传教士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则相对有限,由于加尔文宗更多的是从事新教伦理的宣传,而没有投入小学和医院的建设<sup>[13]</sup>。

除此之外,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合作、信任也是一国文化的重要表现,而历史对这种文化的塑造意义重大。Mokyr(2008) 认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因为存在一种“绅士文化”,这种社会规范强调人们之间的诚实与合作,而这又为工业革命及英国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sup>[14]</sup>。Liang(2010) 则将儒家文化的特征与东亚经济奇迹联系起来<sup>[15]</sup>。东亚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都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如尊师

重教,强调家庭关系等。从而促进这些国家人力资本投资以及为子女储蓄,这些都为东亚经济的起飞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而当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时,儒家传统将会阻碍其经济发展。Liang(2010)的研究发展与调和了Weber在20世纪早期提出了儒家文化将阻碍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而对于非洲存在的不信任文化,Nunn(2011)从历史上的奴隶贸易数据入手,揭示了个体对他人信任度的报告与其所在族群历史上被带走奴隶的数量呈反比关系<sup>[16]</sup>。接着作者又对可能导致这种负向关系的渠道进行了分析,一方面,奴隶贸易改变了受奴隶贸易影响部落的文化规范,使得他们天生就缺乏信任。另一方面,奴隶贸易引起了这些地方法律和政治制度的退化,而这一弱的制度又使得人们之间变得不信任。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文化与历史密切相关,并进一步导致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

### 三、研究问题的方法

随着历史数据的日益丰富及处理技术的完善,基于历史的视角,研究历史事件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造成的长期影响,相关的经验研究文献越来越多,使用的实证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历史事件与历史数据用于经济研究存在的一个好处就是其具有外生性,某种程度上它具有自然实验或准自然实验的性质,由于它不受今天我们所研究的种种经济现象的反向影响,从而得出的研究结果具有可信性。具体而言,通过梳理使用历史事件与历史数据研究经济问题的文献,所使用的计量方法大致包括以下几种:工具变量法、倍差法、合成控制法、断点回归、倾向得分匹配等。我们对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中常用的三种方法进行简单介绍和评述。

#### (一) 工具变量法

工具变量法(IV)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是模型参数估计的两种重要方法,如果模型中某一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相关时,使用OLS估计模型参数则是有偏的。此时需要找到一个外生的工具变量,使得该工具变量与其所代表的解释变量高度相关,而与随机误差项无关。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关键是选择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而由于工具变量不是唯一的,从而使得工具变量选择有一定的随意性。另外,由于误差项实际上是

不可观测的,因而要寻找严格意义上与误差项无关而与所替代的解释变量高度相关的变量事实上是困难的。尽管找到一个好的IV非常困难,但在现有的文献中,好的IV大多是与历史和地理因素有关的一些变量。由于历史和地理因素具有相对稳定性与外生性,使得其可以作为IV的理想选择。

Acemoglu(2001)在解释制度对前殖民地国家长期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时,为解决制度的内生性问题,使用潜在殖民者的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sup>[4]</sup>。一方面,该死亡率直接决定殖民者是否在殖民地国家长期定居,而是否长期定居又影响着早期殖民地国家当时的国内制度,由于制度的延续性,这些国家当时殖民地时期的制度会决定今天的制度,进而影响今天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殖民地时期的死亡率与今天殖民地国家经济表现无关。因此,历史上潜在殖民者死亡率可以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基于该思路,Acemoglu(2001)建立如下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模型:

$$\begin{aligned} \log y_i &= \gamma + \alpha R_i + X_i' \gamma + \varepsilon \\ R_i &= \zeta + \beta \log M_i + X_i' \delta + \mu_i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  $y_i$  为国家  $i$  的人均收入,  $R$  用来衡量国家  $i$  当前的制度。在第二阶段回归中,作者用欧洲殖民者在1900年之前面临的死亡率作为国家  $i$  当前制度的工具变量。基于回归结果发现:在欧洲殖民者面临较高死亡率的地区,欧洲殖民者不会长期定居下来,而是更可能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攫取性的制度,而这种制度会一直延续至今。使用欧洲殖民者在不同殖民地面临的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能够为解释制度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中所起的决定作用。

虽然该工具变量之后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例如,对于那些历史上死亡率更高的地区,其面临着恶劣的自然环境,而恶劣的自然环境又会直接影响经济表现,因此,死亡率对今天经济表现的影响可能不是通过制度,而通过其它一些渠道(如人力资本)。但是尽管如此,Acemoglu(2001)为我们寻找工具变量时提供了新的方向,即从历史数据中寻找。

Dittmar(2011)在分析中世纪欧洲印刷术的发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使用了地理距离作为

工具变量<sup>[17]</sup>。自从 Gutenberg 于 1456 年在德国梅茵茨发明了第一台印刷机,在随后的几十年印刷术逐渐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印刷机的发明给欧洲带来了深远影响: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培育了商业发展的知识和技能。Dittmar(2011)用城市人口的变化来衡量城市的发展,通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来估计信息技术的传播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Y_{it} = \theta_i + \delta_i + \sum_{t=1300}^{1700} \alpha_t D_t T_i + X_i' \gamma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核心解释变量  $T$  表示 1500 年前印刷术是否传播到地区  $i$  的虚拟变量。然而,在估计印刷术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时,如果采用 OLS 估计所得结论往往是有偏,因为那些引进印刷术的城市可能之前经济比较发达,为解决这种选择性偏误,作者用各城市与梅茵茨的距离作为印刷术的工具变量。由于距梅茵茨的地理距离对各地经济发展不会有系统性的影响,而对印刷机的引进则直接相关。因此,该工具变量可以将印刷术对各地地区经济的影响较为准确的估计出来。根据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在 1500~1600 年,那些引进印刷术的欧洲城市比其它类似的城市增长快 60% (城市人口数量),而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这些城市较其它城市并没有相应的优势。

与此类似,使用地理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的相关研究还有:Becker(2009)研究历史上普鲁士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影响,并对 Weber(1920)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相关理论进行验证<sup>[12]</sup>。从各国数据来看,相对于天主教,新教徒比例越大的国家经济越发达。由于新教改革使得《圣经》在新教徒中广泛流传,为阅读《圣经》新教地区识字率也更高。而更高的人力资本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了基础。为将新教徒比例外生化,作者选取普鲁士各县距离维腾堡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作为宗教改革的起点——维腾堡,距离维腾堡越近的县,其新教徒的比例相对也越高。而新教徒较高的县,其新教入学率要高于天主教,高入学率转化为人力资本,从而导致较高的增长。根据该思路,Becker(2009)建立三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方程:

$$\begin{aligned} Y &= \alpha_1 + \beta_1 PROT + X' \gamma_2 + \varepsilon_1 \\ LIT &= \alpha_2 + \beta_2 PROT + X' \gamma_2 + \varepsilon_2 \quad (3) \\ PRPT &= \alpha_2 + \beta_2 WITF + X' \gamma_3 + \varepsilon_3 \end{aligned}$$

其中, $Y$  为普鲁士 452 个县的经济表现, $PROT$  为每个县新教徒的比例, $LIT$  为每个县 10 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 $WITF$  为各县距维腾堡的距离。通过三个回归方程,Becker(2009)用各县距维腾堡的距离作为各县的人力资本(识字率)的工具变量,从而将各县人力资本外生化。基于回归结果,Becker(2009)认为普鲁士识字率的差异能够解释各县经济发展水平的全部差异。

## (二) 倍差法

倍差法(DID)是研究历史事件或政策对经济可能产生影响的另一种常见方法,倍差法主要用于分析,受某一政策或事件冲击的个体(处理组)在冲击前后的变化与没有受到冲击个体(参照组)在冲击前后的变化。它的优点在于通过差分消除两组个体共同的时间趋势,但这也是其局限所在,如果冲击之前两组个体存在不同的时间趋势,则无法通过差分消除该时间趋势,从而使得对政策影响的估计不准确。因此,在使用倍差法时,首先要检查处理组与参照组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趋势。此外,在对估计某一冲击的影响时,常常假定此时不存在其它冲击发生,否则,无法准确估计出该冲击的影响。另外参照组的选择也非常关键。

历史事件为该方法是使用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因为历史事件具有自然实验或准自然实验的特征,由于历史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且在当时会对其发生地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而该冲击往往会对其发生地带来长期的影响。为估计这些影响,就可以通过构造处理组与参照组,将该冲击的长期影响识别出来。

Qian(2008)通过使用倍差法,估计 1978 年之后,中国两次农业政策改革对农村地区经济及男女性别带来的影响<sup>[18]</sup>。1978 年之后,中央政府为增加农村收入、提高农产品流动性、农产品构成多样化。逐步放松对农业生产的高度计划,及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特别是经济作物。另外,将农业生产决策权交给农户,实行家庭生产责任制,允许家庭根据农产品价格变化,调整生产计划。作者特别关注政策变化之后,茶叶价格与果园价格的变化,对受影响地区男女性别比的影响。由于女性在茶叶生产存在比较优势,而男性在果园生产中存在比较优势,则产茶区与非

产茶区在政策变化前后性别比例应该发生变化,同样,果园生产区与非生产区性别比例也可能受到政策冲击的影响。根据中国农业政策改革的自然实验, Qian(2008)建立了如下 DID 方程:

$$sex_{ic} = (tea_i \times post_c) \beta + (orchard_i \times post_c) \delta + (cashcrop_i \times post_i) \rho + Han_{ic} \zeta + \alpha + \psi_i + \gamma_c + \varepsilon_{ic} \quad (4)$$

其中,被解释变量  $sex_{ic}$  为地区  $i$  男性比例,核心解释变量即产茶区变量  $tea_i$  和政策时间  $post_c$  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tea_{ic}$  表示地区  $i$  的茶叶产量,  $post_c$  表示个体出生于 1979 年之后的虚拟变量。如果  $\beta < 0$ , 则表示 1979 年之后农业政策改革会降低产茶区的新生男性比例。

通过该 DID 模型,作者发现地区茶叶价格的上升提高了产茶区女性的比例,而果园价格的上升则提高了男性比例。

Nunn(2011)从历史实验的角度,研究了新大陆发现之后,土豆的引进对旧大陆人口及城市化的影响<sup>[19]</sup>。土豆与旧大陆其它作物(如小麦、大麦、燕麦)相比存在巨大的优势,无论是从其含有热量还是土地产量,都远高于其它作物,这为人口增长与城市化提供了食物来源。由于土豆种植受到特定地理条件的限制,因此,土豆引进对不同地区带来的冲击存在差异。那些不适宜种植土豆或未引进土豆的地区,其人口和城市化与之前相比便不存在显著差异。

作者通过建立如下 DID 方程,估计出土豆引进对当时世界人口变化和城市化的影响。

$$\gamma_{it} = \sum_{j=1400}^{1900} \beta_j potato_i \times I_t^j + \sum_{j=1400}^{1900} \delta_j AllCrops_i \times I_t^j + \sum_c \tau_c I_t^c + \sum_{j=1400}^{1900} \rho_j I_t^j + \varepsilon_{it} \quad (5)$$

其中,被解释变量  $\gamma_{it}$  为地区  $i$  的总人口,总人口的年增长率,城市化率和城市化的平均年增长率。核心解释变量为地区  $i$  土豆种植面积占可耕种面积的比例与时间区间  $I_t^j$  的交互项, Nunn(2011)分别考虑了 10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和 1900 年这七个时间节点。基于该对 DID 方程的估计,发现排除其他因素影响,土豆的引进可以解释 1700 ~ 1900 年旧大陆人口与城市化增长的 1/4。另外,使用同一国家城市层面的数据,采用同样的方法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 (三) 合成控制法

使用倍差法估计政策冲击的影响时,参照组的选择受到一系列条件的限制:参照组不受冲击的影响,冲击发生之前处理组与参照组有共同的时间趋势。因此,当这些假定条件得不到满足时,则我们就找不到相应的参照对象,构成反事实组,从而无法准确估计政策的效果。另外,关于参照组的选择也存在着随意性。这种情况下,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很好的解决了这种比较个案研究(comparative case studies)中参照组的选择问题。与倍差法不同,合成控制法在选择参照组时,将所有不受政策冲击的地区都作为其参照组,并给每一个地区一个权重,权重的决定根据如下规则决定:在政策冲击之前,处理组与参照组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观测到,此时,用加权参照组的实际情况来模拟处理组的实际情况,当该模拟得出的结果是无偏时,我们就决定了这样一组权重向量,并使用同样的权重构造政策冲击的反事实组,对政策的效果加以估计。

历史事件往往构成对其发生地的冲击,如何将该事件的长期影响合理的估计出来,需要选取相应的参照对象,合成控制法为参照对象的构建提供了很好的方法。Abadie(2003)使用该方法估计了发生在 1970 年代早期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恐怖袭击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作者使用西班牙其它不受恐怖冲突影响的地区构建了一个合成控制地区,该合成控制地区构成了一个反事实组,其代表如果未发生冲突巴斯克地区应该有的经济表现<sup>[20]</sup>。通过对比巴斯克地区与其合成控制区的人均 GDP,作者估计出由于恐怖冲突使得巴斯克地区人均 GDP 下降了约 10%。此外, Abadie(2003)用 1998 ~ 1999 年的停战作为一个自然实验,通过使用那些主要业务位于巴斯克地区的公司股票的表现,估计停战可能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停战协议可信时,这些公司股票相对有一个积极的表现,而当停战协议结束时,则有一个负的表现,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冲突对巴斯克地区带来的影响。

### 四、结论与评述

随着历史事件和历史数据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不断丰富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与发

展经济学之前所忽视和无法解释清楚的东西,通过从历史的视角入手,往往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如制度这一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究竟如何度量及其本身如何决定,在研究当中往往难以清楚界定。通常的做法是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而历史事件和历史数据由于其本身的外生性,将其作为工具变量用于计量回归通常能够得出理想的效果。

近些年国内外的在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发展很快,并得出了许多有意思的结论。但是,由于历史数据收集非常困难,加上历史数据的缺失,使得这种分析方法的使用受到很大限制,这也是今后利用历史事件和历史数据对经济发展进行的解释面临的最大困难。对于该问题,今后可能存在的解决途径有,采用先进的估计手段,间接的将历史数据估计出来。目前,国外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如,De Long, 1993<sup>[21]</sup>; Robert 2001<sup>[22]</sup>; Acemoglu 2002<sup>[23]</sup>)。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期,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法律和制度问题、不平等、性别失衡问题等。如何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似乎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近年来,国内经济学者对应用历史数据研究经济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产生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如对大饥荒问题的研究(Meng, 2009<sup>[24]</sup>; Chen, 2007<sup>[25]</sup>; 范子英, 2010<sup>[26]</sup>; 杨涛, 2010<sup>[27]</sup>; 程令国, 2011<sup>[28]</sup>)、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研究(Giles, 2008<sup>[29]</sup>; 杨娟, 2011<sup>[30]</sup>)等。此外,国内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根据自身的优势,在共同的研究兴趣下展开合作,并加大推广历史数据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例如,在耶鲁大学和清华大学陈志武教授和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史教授马德斌等人的推动下,2013年清华大学举办了“第一届量化历史讲习班”,至今该讲习班已举办了三届,该讲习班有力的推动了量化历史研究在国内的发展。虽然最近十几年来,国内学者利用中国历史数据和事件研究经济学问题的文献逐渐增多,但是相对于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我国历史视角下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仍相对不足。未来通过鼓励将历史学 and 经济学结合研究,促进历史事件和历史数据在我国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意义重大。

#### 参考文献:

- [1] 道格拉斯·诺斯, 罗伯特·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
- [2] Acemoglu Daro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3] 孙圣民. 历史计量学五十年: 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4): 143-161.
- [4]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James 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5): 1369-1401.
- [5]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James Robinson, Yungyong Thaicharoen. Institutional Causes, Macroeconomic Symptoms: Volatility, Crises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3(50): 49-123.
- [6]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James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3): 546-579.
- [7] Acemoglu Daron, Davide Cantoni, Simon Johnson, James Robinson. The Consequence of Radical Reform: The French Revolu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7): 3286-3307.
- [8] Acemoglu Daron, Camilo García-Jimeno, James A. Robinson. Finding Eldorado: Slavery and Long-run Development in Colombia [J]. NBER Working Paper, 2012.
- [9] Banerjee, Abhijit, Lakshmi Iyer.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Legacy of Colonial Land Tenure Systems in Indi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4): 1190-1213.
- [10] Dell Melissa.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Peru's Mining Mita [J]. Econometrica, 2010, 78(6): 1863-1903.
- [11]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M]. London: Routledge, 1920.
- [12] Becker Sascha, Ludger Woessmann. 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2): 531-596.
- [13] Bai Ying, James Kai-sing Kung. Diffusing Knowledge While Spreading God's Message: Protestantism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in China, 1840—1920 [J]. CUHK Working paper, 2011.

- [14] Mokyr Joel.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5] Liang Ming-Yih. Confucianism and the East Asian Miracle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0(2): 206-234.
- [16] Nathan Nunn, Leonard Wantchekon.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6): 3221-3252.
- [17] Dittmar, Jeremiah, 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hange: The Impact of the Printing Pres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126): 1133-1172.
- [18] Qian Nancy. 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 The Effect of Sex-specific Earning on Sex Imbalance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123(3): 1251-1285.
- [19] Nunn Nathan, Nancy Qian. The Potato's Contribution to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Evidence from a Historical Experiment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 26(2): 593-650.
- [20] Abadie Alberto, Javier Gardeazabal. The Economic Costs of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the Basque Countr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1): 113-132.
- [21] De Long, Bradford, Andrei Shleifer. Princes and Merchants: European City Growth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93, 36(2): 671-702.
- [22] Robert Allen. The Great Divergence in European Wages and Price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First World War [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01(38): 411-447.
- [23]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James Robinson.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8): 1231-1294.
- [24] Meng Xin, Nancy Qian.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 of Famine on Survivors: Evidence from A Unique Natural Experiment Using China's Great Famine [J]. NBER working paper 2009.
- [25] Chen Yuyu, Li-An Zhou. The Long-term Health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1959-1961 Famine in China [J].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07(26): 659-681.
- [26] 范子英. 关于大饥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J]. 经济学(季刊) 2010, 9(3): 1151-1162.
- [27] 杨涛. 探讨大饥荒的成因: 集权、计划失误与政治行为的影响 [J]. 经济学(季刊), 2010, 9(3): 1143-1150.
- [28] 程令国, 张晔. 早年的饥荒经历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 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 [J]. 经济研究 2011(8): 119-132.
- [29] John Giles, Albert Park, Meiyang Wa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Disruptions to Education, and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Urban China [J].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8.
- [30] 杨娟, 李实. 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影响 [J]. 世界经济文汇 2011(5): 50-63.

(责任编辑: 黄明晴)

## A Research of Developmental Economics und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Zhang Jun<sup>1 2</sup>

(1.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Banking, CASS, Beijing 100028, China; 2. Industrial Bank, Fuzhou 350003,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reviews and comments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by using historical events and data for economic research, elaborating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content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difficulties. Among them, main methods used includ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and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Most studies ar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xplain its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different countries. At present, the main problem is the lack of historical data. It's significant for us to promote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data in the economic research of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 historical events; historical data;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